

●学术访谈

编者按:杨中芳,我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奠基人和持续引领者之一,曾任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任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杨中芳教授和杨国枢、黄光国等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大陆各地开设社会心理学讲习班,致力于大陆社会心理学之重建。1997年创建华人本土心理研究基金会,2017—2020年任董事长。长期游走于海峡两岸和香港,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学、自我心理学、中庸心理学。至今出版《如何研究中国人》《如何理解中国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情感与信任》《本土心理研究取径论丛》《华人本土心理学30年》(三册)等著作(含主编),在《心理学报》《社会学研究》《本土心理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2017年获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颁赠“终身成就奖”。杨中芳教授长期致力于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方法,大陆社会心理学的重建与发展,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建构(聚焦于自我和中庸思维)等学科建设与学术使命的探索与积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心理学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为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本次访谈即围绕“华人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相关问题展开。

华人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杨中芳教授专访

杨中芳¹ 韦庆旺^{2*}

(1.北京大学 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2.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 100872)

摘要:发端于中国台湾的华人本土心理学,旨在跳出西方心理学理论、方法及知识体系,“将华人当华人来研究”,最终建构基于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贴合中国人的心理学知识体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亲历过美国社会心理学文化反思的杨中芳教授长期游走于海峡两岸和香港,在大陆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重建之初,即将华人本土心理学介绍给大陆心理学界,并通过培训人才和组建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对大陆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40多年来,大陆的心理学仍然不可避免地经历了以学习西方为主的发展与繁荣,本土心理学的声势却相对微弱。直到最近,我国社会科学界兴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大潮,围绕心理学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论高潮迭起。杨中芳教授以其持续40多年的华人本土心理学探索经验,以及围绕中庸心理学所建构的中国文化视角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对当下如何建构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典范和宝贵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传统文化;心理学本土化;中庸思维;华人本土心理学;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简介:杨中芳,北京大学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韦庆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社会阶层视角下的文化心理变迁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BSH14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4)03-0086-09

DOI:10.19563/j.cnki.sjtk.2024.03.009

* 通信作者:韦庆旺,E-mail:weiqingwang@ruc.edu.cn。

华人本土心理学立足于中国文化/社会/历史背景去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其建立的心理知识体系自然是自主的,不同于西方的。作为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奠基人和持续引领者之一,杨中芳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初,长期穿梭于海峡两岸和香港,对大陆心理学的重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如今,大陆心理学经过快速发展之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基础和信心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此,作为探索先行者和范例的华人本土心理学,其发展经验和研究成果有何借鉴意义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韦庆旺(以下简称“韦”)围绕这个问题对杨中芳教授(以下简称“杨”)做了专访。

一、穿梭于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华人本土心理学推手

韦:两年前,您受邀在中国“百年百位”心理学家大讲堂上做报告,回顾了自己的心理学人生。请问,您对自己的心理学学术生涯是怎样定位的?您的留美及长期穿梭于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经历与您的学术生涯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

杨:这几年,我对心理学人生的回顾和总结,源于五年前受邀参与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周晓虹教授组织的一个口述史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收集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中国社会学重建时期参与者的个人经历作为史料。当时我是以一个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身份作为采访对象,被定位为华人本土社会心理学的推手。^[1]两年前,我在中国“百年百位”心理学家大讲堂上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定位。

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发展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经历常常具有紧密的联系。我祖籍山东蓬莱,1945年出生在天津,1948年随父母迁往台湾,1962年就读于台湾大学(第二年转入心理学系),大学时代遇到后来的华人本土心理学发起人——杨国枢先生^①。大学毕业后,我跟随中国台湾的留学潮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1973—1976年先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76年起先后任教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和南加州大学的商学院。1980—2003年,我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和香港大学心理学系,其间的1991年在台湾中正大学心理学系做客座教授。1984年,我从商学院回归心理学系之后,正式立志从事华人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同年通过首访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开始了长期访问大陆心理学教研机构的征程,1988年和1990年独自在大陆举办“社会心理学硕士生暑期培训班”,1992—1997年与杨国枢、黄光国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合作,在大陆各地开设“社会心理学讲习班”,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陆社会心理学的重建。2001年,我于计划由香港大学提前退休之际,接任了中山大学(广州)心理学系复建的创始主任,至2006年退休。之后以线下及线上小型研讨会和编著论文集等形式,在海峡两岸和香港持续推动华人本土心理学和中庸心理学的研究至今。可以说,从1984年开始,我确实是长期穿梭于海峡两岸和香港,尤其是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复系之初的两三年,我几乎每周在香港和广州之间通勤。你是我在中山大学带的第一届硕士,跟我读书期间也没少帮我搬运从香港带来的书籍资料和其他建系物资啊!

在美学习和工作期间,在学术上,我既经历了西方社会科学的严谨训练和其内部对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反思,又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由格根(Gergen)等人引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基于历史及个人主义文化反思的洗礼,更因为与在美国访学的杨国枢先生接触交流而认同了他提出的心理学本土化理念。在社会阅历方面,我亲历了美国青年“大造反”及其所引起的社会价值大转变(比如女权运动、黑人的民权运动)。这些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令我意识到任何社会心理与行为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必须在其脉络中去理解及评价它们,才能体会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方面,我参与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中国留学生的保钓运动,那场运动的影响至深至远,国家情怀及爱国意识变成了实

^①杨国枢(1932—2018),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先后担任香港大学、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副院长。他是华人社会心理学界最早提出创立“本土心理学”倡议并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一代宗师。

际的行动,不少当时的领袖人物后来都离开了美国,回到中国大陆工作,这对我后来决定回到大陆来教书办班都有一定的奠基作用。

韦:在您 1984 年到大陆交流之时,大陆的心理和社会心理学处于重建初期,而台湾和香港已经开始推动华人本土心理学了吧?大陆与港台地区心理学发展的差异,对您在大陆交流讲学及助力大陆心理学的发展方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杨:是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台湾的心理学经过了 30 年以上的“移植式”发展过程,从研究问题到研究方法和理论建构,都以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心理学为主。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已有学者到美国留学再回到台湾的大学任教的情况。杨国枢先生有感于在美国访学的体会,1969 年回台湾后开始酝酿,从 1975 年开始小范围讨论本土化,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是与同仁在台湾,稍后又与香港的学者一起,发起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包括心理学本土化)。1984 年前后,我在港台地区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的初期正式全身心投入心理学本土化的事业当中。1988 年,我所在的香港大学心理学系主办“迈进中国本土心理学的新纪元:认同与肯定”研讨会,邀请来自我国香港、台湾、大陆及美国的有关学者,就心理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加以讨论。会后,我与高尚仁合编出版了三卷本研讨会的论文集《中国人·中国心》。

大陆的心理由于停滞了十多年,在改革开放后开始重建之时,几乎没有多少学科发展的基础可以依赖,好处是也没有受到西方心理学的主流阴影笼罩。这种情况在我来说,似乎看到了一种希望,希望大陆的心理在这个刚开始的阶段,不要盲目地跟从西方的研究内容及方法,而是在自己的社会范畴中,依循它自己的文化及历史背景来选择它的研究题目及研究方向,这样可以避免台湾心理学走过的弯路。1987 年,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一文,以自己 20 年的体验和台湾近 30 年向西方学习所积累的经验得失,系统论证了如果将西方社会心理学直接照搬或移植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只能导致重复、肤浅,并与中国脱节。^[2]因此,欲要避免重走这样的冤枉路,就应抛弃懒惰和传统的“从师习性”,从头开始,脚踏实地地对中国人自己的社会行为做本土的考察和描述,并进一步创造出可以涵盖中国人行为的理论架构,设计出真正适合于中国人的研究工具,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社会心理学。当时那种盼望大陆心理学少走弯路的急迫心情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

在这种急迫心情的驱使下,除了访问大陆心理学院系和参加大陆的心理学相关研讨会进行交流以外,从 1988 年开始,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在大陆开办社会心理学讲习班这件事上,想通过人才的培养,在众多青年学子心中早早种下本土心理学的种子。在独立开办两届讲习班之后,从 1992 年到 1997 年,杨国枢先生亲自带领豪华的港台地区学者团队支持社会心理学讲习班,六年共培养了 173 名年轻学者。这些学者中有很多已经成长为大陆各个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掀起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浪潮,大陆心理学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大规模学习西方心理学的道路。

韦:看来,本土心理学在大陆并没有像您最初所期望的那样受到重视。然而,最近几年,有关社会学(包括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在大陆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要不要本土化,到怎样本土化,引起了激烈的争论。^①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论及其对大陆心理学发展的影响?

杨:实际上,关于心理学及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本土化,作为一种思想或学术倡导,其讨论是一直存在的。比如,潘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要建立有我国自己理论体系的心理学,林崇德和俞国良论述了心理学中国化的过程和道路,黄希庭和范蔚分析了人格研究中国化的思路与应用前景。^[3-5]在我看来,每次

^①2018 年 2 月,谢宇在《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随后被各种社交媒体转发,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被翟学伟称为“一件社会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大事”。同年,梁玉成和翟学伟先后在《新视野》和《探索与争鸣》撰文与谢宇商榷,形成论争之势。2020 年,周晓虹和贺雪峰分别在《社会学研究》和《探索与争鸣》发表文章,加入这场论争,进一步深化了有关本土化的讨论。

有关心理学及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与争论,固然受到当时国际国内社会环境形势的影响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争论的焦点和本质始终没有变。1991年,我曾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中国社会心理学”》一文,试图澄清有关“本土化”的几个误解。^[6]首先,很多对本土化有担忧的人,把“心理学本土化”看成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认为与“洋为中用”的顽固本质一样,是不肯全面解放自己的思想,这是思想上的误解。其次,认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意味着专门研究其他文化及国家没有的心理现象、排斥外国的概念及理论、只要是以中国人为研究对象就能自然具有中国特色、只有以古代心理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为根基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这些是对研究方向和策略的误解。文中,我一一驳斥澄清了这些误解。

现在大陆不仅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倡导发展中国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且强调文化复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可能导致一些学者对心理学本土化产生类似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担忧与误解。因此,当前这轮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争论,可以看作以往争论的延续。大家争论的焦点还是本土化与国际化/全球化(地方性与普遍性)、经验描述性与学术规范性、发扬文化传统与急切拥抱新科技和现代化等几个相互关联的矛盾,好像本土化就意味着只关注中国自己的心理现象,很容易采用经验描述性的方法进行研究,一说到理论建构就回到传统文化的老古董中去,这样积累的心理知识既不能与国际接轨,也缺乏学术规范性,难以进行西方式的基于实证和学术规范而产生的可累积的知识体系建构。在我看来,这些争论的问题仍然没有脱离我们以前的讨论范围。1999年,我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一文,文中强调,本土化是指研究者在研究时思考问题的本土化,亦即研究者逐渐把自己文化传统放在研究思考现代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现象及行为框架之中的过程,它与现代化及全球化这两个实质社会变迁的概念属于不同层次,无所谓相互排斥,甚至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之讨论及研究亟须本土化。^[7]

虽然当前大陆社会科学界有关本土化争论的问题我们很早就讨论过,似乎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大陆在本土化方面进展不大,但我不仅不觉得这样的争论没有意义,更觉得现在的争论代表了大陆学界本土化意识的真正觉醒,是非常令我欣慰及欣喜的。21世纪初,我与杨宜音回顾反思大陆本土心理学的发展时,曾经慨叹,由于早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对社会心理学是什么尚处在从翻译外国人的书里去窥探的阶段,我和杨国枢先生推广的本土心理学对大陆来说是“过早”地来临了,而经过快速发展之后的面向全球化更快发展的世纪之交,大陆学者又忙于把刚刚可以掌握的心理学知识转化为实用的技术及产品,去转卖给求之若渴的应用者,加之重视发表英文论文向国际接轨的大环境,本土心理学研究又被视为“等不及”去做的,成为心有余而力不及的事项。^[8]现在的争论表明本土心理学在大陆迎来了转机,心理学经过40多年的引进,现在终于到了要反省的时间了,这是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生而具有之的使命。看到这种使命感终于从大陆学界很多学者的灵魂深处浮现出来,我感到由衷的开心。

二、在本土心理研究中结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

韦:港台地区本土心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许多争论,这些争论后来解决了吗?港台地区本土心理学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杨:港台地区本土心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产生过很多争论,有些争论甚至一直持续至今。但是,从是否建立反思意识的角度来看,港台地区心理学恰恰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达成了本土化的共识,因此在要不要进行本土化这个问题上是较少争议的,或者说本土心理学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曾经一度是研究的主流。不过,关于如何选择研究课题,以及如何去思考研究问题,即关于如何进行本土化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才是本土的问题,成为长期争论的焦点。许多同是赞成做本土研究的人,在讨论到如何去进行本土研究时,想法却不尽相同。由于台湾本土心理学的跨学科氛围,很多学者在讨论本土研究

时,倾向于与哲学、历史甚至宗教等问题相纠缠,争论了很久还是很难提出来做研究的具体方案。这种情况让许多尚站在本土研究门槛外的青年学者望门怯步,也令另一批认同本土研究后只想知道如何具体做本土研究的人心生失望。因此,在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心理学本土化的热潮之后,进入21世纪,很多青年学者和认同本土研究的后来者进行本土研究的热情反而逐渐减退了。

在我看来,2000年前后是华人本土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首先,海峡两岸和香港的心理学都随着世界的全球化而寻求积极融入国际心理学,同时文化心理学受到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关注而成为热点,使得跨文化比较和追求人类普适性的文化心理学在国内外都完全盖过了首先要聚焦当地文化的本土心理学之风头。其次,在华人本土心理学内部,海峡两岸和香港渐渐趋同,都更加注重国际化而不是本土化。台湾的本土心理学随着杨国枢先生担任亚洲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开始向亚洲和西方输出研究成果,这一国际化及跨文化学术交流的视角使得新开展的专心关注解释当地人心理的本土心理研究式微。香港原本就十分国际化,加之越来越重视采用国际化的考评机制参与全球大学竞争,本土心理学同样难以受到重视。大陆在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迅速在“移植式”心理学的进展方面追赶西方,随着越来越多的受过西方心理学学术训练的留学人才回国任教,西化的心理学被推向新的阶段。再次,从华人本土心理学者的个人选择来看,秉持不同研究取向和研究策略的研究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彼此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从整体上看,华人本土心理学似乎暂时进入了作为“少数人坚持的事业”阶段。

韦:那么,从学者个人的选择来看,做本土心理学有哪些研究进路呢?您又是如何选择自己的研究进路的呢?请您用一个具体研究的例子来说明。

杨:在刚刚提到的华人本土心理学发展的转折点上,对我而言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即我在2000年第五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上组织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专题研讨会。我邀请了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参与讨论,它在让我看到大家的分歧及青年学者听众的困扰的同时,也让我从不同视角看到了坚持做本土研究的意义。这些意义中,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研究个体要选择哪一类研究课题及要如何去思考问题。于是,我决定从总结和系统呈现本土心理研究的不同取径出发,以研讨会上交流的论文为基础,又选编了其他一些相关论文,主编出版了《本土心理研究取径论丛》一书。书中,除展示了本土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和国际本土化浪潮这两个宏观背景以外,将开展本土心理研究的具体研究进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在西方心理学实证科学范式之内,通过贴近中国人的实际去提升研究的本土契合性,达到在沿用西方主流研究范式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造的目的;第二种是从西方的科学哲学中那些不同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流派中汲取营养(如现象学及诠释学),采用质性和人文的方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第三种是从中西文化在基本心理规律的诸方面存在本质的区别出发,旨在以中国文化对各种心理现象的独特理解为指导框架,建立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全新知识体系。^[9]

我自己所选择的研究进路,是结合现代社会科学和传统文化,即结合上述的第一种和第三种进路。当然这个结合并不是容易的,因为现代社会科学跟传统文化本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让我以自己所从事的中庸思维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2009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了《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实例: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文,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程序,将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概念付诸实证检验。^[10]首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庸融合了古代中国各个学派的精髓,是儒释道都非常重视的思想,而现代中国人仍然采用中庸之道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中庸所内涵的一套思维方式与西方社会心理学所内涵者大相径庭,因此,它具有与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进行对话及互补的潜力。其次,中庸心理学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及程序包括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象的构念化与操作化,实证资料的收集,以及对资料进行分析以回答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在这个实证思路中,构念化通常也包括对研究构念之间关系的阐述,以及随着实证检验不断修正构念化的过程。结合两种思路,我和赵志裕将中庸建构为一套“元认知”的“实践思维体系”,即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要如何选择、执行及纠

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然后,基于十多年实证研究的积累和修订,我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发展成一套包含一个集体文化思维层面和三个个体思维层面活动的系统。

韦:您觉得做本土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对其他学者,尤其是有志于做本土心理研究的青年学者,在进行本土研究时有何建议?

杨:不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大陆开办社会心理学讲习班,还是2001—2006年担任中山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我始终认为心理学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应该首先了解和掌握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流实证研究范式及其背后的理念,然后再培养从文化的角度对现有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进行批判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对于具体开展本土研究,重心要放在如何去找值得做的研究,而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必须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做出策略上的选择。在2005年由杨国枢、黄光国和我主编的《华人本土心理学》中,我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策略”一章中建议本土心理学采用如下的策略步骤:(1)以实际观察当地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呈现的现象为研究素材,从中找寻值得做的研究问题;(2)用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及惯用的概念、想法、信念及经验来帮助审视、描述及整理问题中所显现的模式;(3)发掘当地人运用以彼此沟通及相互理解的意义系统,从而用之理解所呈现模式背后的意义;(4)凭着这一理解,提出一套对研究问题的解说或理论;(5)研制适合探研当地人的程序及方法;(6)对解说或理论进行实证检验、延伸或推广;(7)建立更能贴切地理解当地人及对他们更有用的心理学知识。^[11]

对于青年学者,包括学习心理学的学生,我想这些策略可能是有些复杂了。简化一些,我自己的学术生涯如果有什么值得与大家分享的,那就是我很幸运地培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也希望每一位青年学者都能做一些独立的思考。不可否认地,现在西方的教科书以及文献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但我希望大家从其中得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去理解他们思维的来源和重点,为什么一个问题他们会从那个角度去看。因此,我们要对他们做的研究的背景,特别是社会背景,以及政治立场等进行探索。第二个重点是学习他们撰写论文的逻辑思维、论述格式及严谨度,这方面,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写文章所缺乏的。西方文章的整体性、格式及逻辑的严谨性,我觉得是值得学习的。此外,最重要的是习惯反问、反思和有依据地批判。我们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只是问,更重要的是要很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已经出版的成果不是圣经,都可能其他的解释,值得认真、有条理、符合逻辑地去找其他可能的解释。

三、深入文化的根基探索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韦:华人本土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的本土研究进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大陆的社会科学界正在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您觉得华人本土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怎样的联系?

杨:华人本土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的本土研究进路,最终目的就是建构一套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能够贴切解释中国人自己的心理与行为现象的知识体系。所谓心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即源于对既有的西方心理学知识体系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西方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西方本土心理学,并不必然成为代表全人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而华人本土心理学作为一种本土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不盲从于西方心理学而自主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只要能够贴切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现象,即有效及有价值的知识体系。有些学者可能认为本土化是在西方“化”的基础上“去”西方化的过程,因此,在自主性上仍然难免依赖于西方的既有框架。实际上,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确实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开始使用“中国化”的表述,因考虑到世界上努力跳出西方化而建立自己心理学的不只有中国心理学,因此后来改称“本土化”;而随着主体性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很多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不使用“化”字,比如我自己,更多地使用本土研究、本土进路等词语。

当然,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思路和方式不一定只有本土研究进路这一条路。当前,大陆社会科学界主张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中发展、总结和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是与本土研究进路相辅相成的另一种思路。实际上,杨国枢先生在台湾发起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之初所关注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面对现代化的反应、人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等),这与香港中文大学张妙清的中国人性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的中国民族性变迁研究相互呼应。近年来,从社会心态的持续调研与研究,到心理学助力社会治理,再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大陆心理学紧扣国家政策和社会现实,开展了很多独具特色的心理学研究。^[12-17]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采用本土进路,还是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实践出发所建构的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要刻意与西方心理学划清界限,而将西方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以及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本土心理学都包容在内的心理学知识体系,才是能代表整个人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华人本土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最终愿景是完全一致的,都是通过建构有自己特色的心理学(而不是跟着别人走)而为人类心理学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韦:依据您几十年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经历和经验,您在建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方面是如何做的?您做了哪些尝试,目前的进展和成果有哪些?

杨:简单勾勒我从事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经历,从1984年开始立志做本土心理学起,我是先由主流“自我”心理学开始去反问、反思,阅读,并去寻求新的论点,通过借鉴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有关“文化是人们相互沟通及理解的意义系统”的观点,认识到文化不是在塑造个体的行为,而是为个体运作日常生活提供意义系统。接着在1996年偶然进入中庸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它是一套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思维过程,可以用之建构出一套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意义系统。这个系统重实践、重生活,不在真理、本质问题上打转。根据这一套与西方主流思维不同的思路,我提出一条“中庸进路”作为研究中国人社会心理的本土架构,并对它持续不断地发展完善。说起来,你多年一直是我们的中庸研究团队的主干一员,对中庸心理学研究发展也比较熟悉。自2013年第二届中庸心理学研讨会之后,你多次协助我组织中庸研究的线下、线上研讨会,和我一起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中庸心理研究专辑,去年也完成了《中庸思维发微:在“一分为三”下寻找“中道”》一文,收录在我主编的书中。

从前面提到的本土心理研究进路的角度来看,我始终是结合了传统文化与西方社会科学范式,并且整体上从开始更注重基于西方社会科学去反思和批判,到后面更注重从传统文化的根基去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同时,建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的意识和努力,贯穿了我开展本土研究的始终。在我2001年主编的《如何理解中国人》个人论文集中,把自己多年的文章,分为“知识的文化/社会/历史根源”“文化、社会与个体”“传统、现代与个人”“中国人的释义系统”“重新理解中国人”几个部分。^[18]所谓“释义系统”,正是知识体系的雏形,而“重新理解中国人”则是这个“释义系统”建立之后在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方面的具体应用。之后的2008年,在《本土心理研究取径论丛》一书中,我正式以持续发展的中庸思维研究为切入点,系统阐述如何“迈向建构一套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19]

几年前,在我打算真正“退休”之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令我看到不同文化的差异在疫情面前的强烈而真实的显现,给了我进一步反思、总结和应用毕生之积累的机会。在这三年里我写了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我希望留给下一代心理学的学子们一起共同讨论和研究的论题。这三篇文章中,一篇总结了由我带领及参与的中庸研究之历史、发展以及现状,并提出了一些后续可以深入探讨的课题。^[20]另一篇是根据对中庸研究所得的一些心得,即我们可以将中庸思维作为研究中国人社会心理的一个本土理论架构,选择换一个脑袋,来探研自己的社会心理学。^[21]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总结了我一生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建构,第二篇更是我深入文化根基探索建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的最新成果。第三篇文章是我在疫情防控期间用自己提出的“中庸行动我”的自我观念,研究中国人在疫情控制过程中的应急灵活性

现象。^[22]这篇文章将我之前所理解的中国人的“释义系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并将其应用在实际生活层面,既体现了本土心理学知识作为“体系”建构的深化,又对其所具有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实践检验。

韦:您40多年持续不断地坚持从事华人本土心理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仰,您所取得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成果更是令人振奋。我想,您围绕中庸心理学所建构的中国文化视角下的本土心理学知识体系,对当下中国心理学界建构中国自主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的伟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最后,请您说说对包含海峡两岸和香港在内的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建议。

杨:从1984年我首访大陆到现在整整40年,这40年大陆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现在都有钱了,生活过得好了。大陆、台湾、香港这三地当时的差距,现在都没有了。我最初寄望大陆在心理学重建之初,能够绕过台湾走过的“移植”弯路,用自己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去找出自己的研究题目,用自己认为最能研究中国人的方式来做研究,累积资料,然后建成我们自己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就在几年前,我还觉得这种想法实在是太过理想主义及乐观了。因为看到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研究课题及进路可以说是席卷了大陆心理学界,本土心理学反而成为全景中的一隅,非常可惜,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遗憾。

然而,最近几年,我感觉这个势头要有所改变了,国内外的局势看起来都有向好方向转变的迹象。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形势转机可能来自我们自己内部。经过40多年的引进,我们已经把主流社会心理学彻底消化运用,现在终于到了我们要反省的时间了,我们要做对得起自己老祖宗的研究,在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及文化环境的脉络里,来研究我们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从全球的视角来看自己,中国已经是强国了,我们不再需要用那种所谓“赶上”别人的心态来衡量自己。老是要严格按照别人(金发碧眼)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丑美,这是还没有走出自卑的阶段。我认为我们现在要有一个自信、创新、领头的心态。是我们开始想自己能做出什么研究成果来贡献给世界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 [1]周晓虹.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84-112.
- [2]杨中芳.试谈大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发展方向[J].社会学研究,1987(4):62-89.
- [3]潘菽.面临着新时期的我国心理学[J].心理学报,1979(1):1-9.
- [4]林崇德,俞国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过程和道路[J].心理科学,1996,19(4):193-198.
- [5]黄希庭,范蔚.人格研究中国化之思考[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7(6):45-50.
- [6]杨中芳.由中国“社会心理学”迈向“中国社会心理学”——试图澄清有关“本土化”的几个误解[J].社会学研究,1991(1):32-38.
- [7]杨中芳.现代化、全球化是与本土化对立的吗?——试论现代化研究的本土化[J].社会学研究,1999(1):57-72.
- [8]杨中芳,杨宜音.从“本土”回到“现代”——杨国枢院士在大陆学术界影响之回顾与前瞻[M]//叶启政.从现代到本土:庆贺杨国枢教授七秩华诞论文集.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343-363.
- [9][19]杨中芳.本土心理研究取径论丛[M].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xii-xxiv.
- [10]杨中芳.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实例: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53-60.
- [11]杨中芳.本土化心理学的研究策略[M]//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81-109.
- [12]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22-463.
- [13]张妙清,范为桥,张树辉,等.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PAI-A)的香港标准化研究——兼顾文化共通性与特殊性的人格测量[J].心理学报,2008,40(7):839-852.

- [14] 沙蓮香, 孙庆忠. 见证与诠释: 中国民族性变迁 30 年——沙莲香教授访谈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0(1): 5-17.
- [15] 王俊秀.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30 年: 回顾与展望[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50(4): 10-16.
- [16] 杨玉芳, 郭永玉. 心理学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2): 107-116.
- [17] 辛自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定位与思路[J].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8, 6(5): 257-261.
- [18] 杨中芳. 如何理解中国人: 文化与个人论文集[M].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1: viii-xxvi.
- [20] 杨中芳. 中庸心理学研究: 源起、现状及展望[M]//杨中芳. 华人本土心理学 30 年: 本土研究取径及理论.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2: 155-232.
- [21] 杨中芳. 要不, 换一个脑袋想心理学研究? 中庸思维作为一条本土进路[M]//杨中芳. 华人本土心理学 30 年: 本土研究取径及理论.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22: 69-112.
- [22] 杨中芳. 从疫情防控看中庸行动我的应急灵活性[J]. 心理学报, 2023, 55(3): 355-373.

[责任编辑: 杨雅婕]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sycholog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ang Chungfang

YANG Chung-fang¹ WEI Qing-wang²

(1. Center f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which originated in Taiwan, China, aims to break away from the Western psychological theories, methods and knowledge system established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study Chinese as Chinese”, and ultimately construct a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cultural/social/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uitable for Chinese people. Since the 1980s, Professor Yang Chungfang, who has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long been travelling across China’s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n China’s Mainland, she introduced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to the mainland psychology circle, trained talents, and reconstructed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which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psychology. Until recently, the mainland social science community has been on the rise of the tid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 debate o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has been hot topic. Professor Yang Chungfang, with her over 4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xploring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d th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ulture built around Zhongyong Psychology, provides a model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how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sychology.

Key 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psychological indigenization; Zhongyong Thinking; Chinese Indigenous Psychology;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sychology